

名家访谈

瓦当：写作是一个自我陪伴的过程

丛宜之 徐淑景 豆子怡



作家瓦当

在大多数人眼中，瓦当先生是一个工作认真负责、写作勤勤恳恳的人。在第三届贝壳儿童文学周期间，他作为主要负责人，家里、办公室、活动地点三点一线，联系、策划、组织三位一体。在如此忙碌的阶段，瓦当先生也没有放下写作，工作的时候尽职尽责，写作的时候一心一意。正所谓“忧郁的日子里须要镇静”（普希金语），瓦当先生是在普通的日子里须用写作带来一抹宁静。

兴趣是一盏灯：
痴迷写作的少年

瓦当本名刘玉诚，在鲁大文学院任教，70后小说家重要代表，著有《多情犯》《到世界上去》《古代的海》等多部长篇小说。在18岁时，瓦当就为自己起了这个笔名，少年意气风发，这种“意气”大抵是从童年就慢慢培养的。家里的老房子、屋檐最前端的一片瓦，少年抬头低头间，对于古文化的热爱日日积攒。

写作需要天赋和努力，但是人们对于天赋二字的定义往往界限不清，在瓦当身上，似乎兴趣也是天赋的一种。他少年时代就喜欢书法、篆刻，在提及写作基础之时，他更是直接道出，自己从小就喜欢写东西。瓦当不止一次提到努力，他说“写作需要一定的天赋，这是先天的基础，但唯有志向和刻苦能提升自己，我的刻苦远远不够”。这后一句，恐怕不是一个作家的谦虚，更多的是一个作家发自内心的面对文学的谦卑。正是有这种谦卑、努力与天赋，瓦当才能从少时的写点“小东西”转变为真正的写作。

谦卑是对文学的态度，可是对于一个作家来说，保持内心的傲气，也是对作品的更高要求。少年人做事，总是豪情万丈，根据瓦当回忆，这个笔名曾被一位前辈这样评价“这个笔名，哪怕是一位才高七斗的人也不敢起啊”。当时的他羞愧不已，但这未尝不是一种继续努力的动力。

瓦当最初写诗歌，后来进行小说创作，这中间的道路曲曲折折，他曾认为诗歌表达情感，迅速而有力，再到后来，他也用一部部小说传达出了属于自己的想法。

瓦当说，每个人的写作之路都会经历投稿被拒的痛苦。他又说，调整心态就是再写再投，不放弃。这可能就是一个作家最初要进行的自我修炼——被否定，再继续。

台上三分钟，台下十年功。这句话也可以用于写作，一个作家的挥毫泼墨，总是笔下一字落，心中有万千。而

心中的万千又是从哪里来的呢？书本、名著还是生活的经验，这个问题应该是个多选题。所以瓦当离开家乡，为自己的写作寻找更为广阔的天地。

转折期：
小说让他活出了最美好的青春

米兰·昆德拉曾说：小说追求的是诗性。诗性，是一种严肃的、崇高的价值追求，贯穿于小说家创作的始终。

笔者：瓦当老师，您之前是写诗歌和随笔的，后来又写小说，您认为这几种文体创作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？

瓦当：我在一篇名为《辽阔世界与散文故乡》的文章中谈到过这个问题，我借用这篇文章里的观点来回答这个问题：“任何一种文体，对应的都是一种生命形态。文体与时间、自然、信仰之间存在着神秘的同构关系。当我们从一种文体进入另一种文体，就打开了世界的另一扇门。我不想就此多说，一是因为自己也知之甚少，二是因为这个问题像世界上所有的秘密一样不愿过多敞开。我只能约略地感知，诗歌是流放所，小说是生死场，散文是大野地；诗歌是血，小说是肉，散文是心。能同时写作诗歌、散文、小说的作者，其实极少。”

《漫漫无声》是瓦当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。恰如小说标题《漫漫无声》，这部作品向我们展现了一种难言的幽寂，瓦当赋予了作品忧世伤生的抒情氛围，给我们带来持久的感动。“岁月漫漫，爱恨无声”，这是文章中让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，带给我很多感触。

谈及《漫漫无声》，瓦当回忆：“《漫漫无声》是我二十七岁时写的，发表时我快满三十岁了。三十岁对许多作家来讲，通常意味着正式上路的开始。这是我三十岁前最重要的一部作品，它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，从此我能写长篇了，而不仅仅是中短篇。对我来讲，可能这就是它的转折性意义。”

对于文学写作者来说，天赋是充满诱惑力的一个词语，对于瓦当而言，我一直好奇，是天赋还是努力来支撑他的写作之路的？瓦当坦言：“天赋几乎就是一个艺术家的天花板，而努力决定他能走多远。有的人一篇封神，有的人越写越好，有的人写着写着就不写了。我见过有坚持写的，虽然没有人家厉害，但经过慢慢地积累，已经越写越好，所以说努力也是一种天赋。”

瓦当：
用文字丈量边界，做有深度的劳动者

在第十四届万松浦文学奖颁奖典礼上，瓦当说《芝罘——米怜秘史》是他献给芝罘、献给烟台的一部书。的确，《芝罘——米怜秘史》固然是一个发明和创造出的奇观，但这个奇观也依托于芝罘实际的地理和历史，具备浓厚的现实感，小说的世界不断地从现实世界当中汲取力量，小说文本与芝罘这片土地血脉相连。

笔者：您的《芝罘——米怜秘史》继凤凰文学奖后又荣获了第十四届万松浦文学奖，但我们了解到这本书您还未出版，只是刊登了一部分在《万松浦》杂志上，您为什么会写这样一部小说？这与您的人生经历有关系吗？

瓦当：这部书是我从生命经验向知识经验的转型之作，这是对我个人写作疆域的大大拓展，也是在写作难度上的极限挑战。如果不是偶然来到芝罘，随后又长期生活在芝罘，就不会有这部长篇小说。我像小说里的那些人物一样，作为一个异乡人来到芝罘，也因此与他们不期而遇。这种相遇激发了我“知识考古”与“灵魂推理”的癖好，也与自己长期以来对知识史的关注形成共鸣。对我来说这是一部非常有难度的书，它涉及到处理极其复杂、庞大的知识经验、历史经验、写作经验与生命经验。为了写这一本书，我读了不少于一千本书，用了整整十年才把它写完，又用了将近两年时间完成修改，脑海里保留了几十个版本的“残骸”。这本书对我个人来讲，最大的意义在于证明自己还是一个诚实的劳动者，哪怕是一个笨拙的劳动者。

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谢有顺这样评价：“瓦当的《芝罘——米怜秘史》是一次叙事冒险，也是一种新的小说家言。以言不凿空的方式书写仿真历史，以正大森然的口气讲述荒诞故事，考据、夹注、互文、汇编这些学术杂语，与传记、回忆、行状、书信等叙事文本融为一体，瓦当试图以反小说的方式重新测度小说的边界，并在一种博学、繁复的叙事美学中探求语言自我绵延的愉悦。‘芝罘’是一个地名，也是一个文化隐喻，‘米怜’实有其人，而又如同一团心气；一个人物里潜藏着许多人物，一部书里隐含着许多部书，瓦当在致敬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写作的同时，也在怀疑、颠覆中贯注着他精深的历史关怀与文化忧思。”

瓦当的研究生郭道鹏这样形容瓦当和他的作品：“瓦当老师是一个耐得住性子打磨精品的艺术家，这在今天这个浮躁的时代实在难得。作为一个资深出版人和作家，瓦当老师以十年功力创造出的作品是不同凡响的。《芝罘——米怜秘史》融入了不计其数的知识、文献、书籍。它的写作和阅读都是有难度的，难度是艺术的宝贵品质。”

笔者：《芝罘——米怜秘史》是您对烟台的记录与思考，富有后现代主义色彩，您之前的作品《到世界上去》也颇具这样的特征。您把历史和未来交织在一起，在继承中开拓创新，您怎样看待文学创新与继承传统之间的关系？

瓦当：没有传统的创新行之不远，没有创新的传统死路一条。创新必须建立在传统的基础之上，而传统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，一直在吐故纳新。事实上，只有真正的创新才能被传统接纳，成为未来传统的一部分。

笔者：5G登场，万物互联，人工智能快速迭代，ChatGPT写作成为热门话题，有人已开始运用AI进行写作，还有网络文学的存在，作为传统写作作家，您是如何看待这些现象的？

瓦当：文学式微甚或文学已死的说法已经喊了几十年，每次技术的更新迭代都带来“狼来了”的呼声，不过有人说，这次是真的狼来了。对于传统写作与AI写作的博弈，老实说，“狼来了”我也没办法。我不是马斯克，我无从判断。我还是放我的羊。至于网络文学，老实说，我是没有看法的。这丝毫没有贬低和排斥的意思。

坊间名人

于大卫的
宣讲情

任春铭

于大卫是干啥的？三言两语说不清。年轻时候，他站上三尺讲台，像扎根沃土，育一方桃李芬芳。后来当上了教育督导，助力一个地区的教育事业发展。再后来，就是2002年，他从钟爱的教育战线上退了下来。他是闲不住的人，他想难道自己就这样闲在家里虚度余生？

于是，于大卫主动找到地方党组织，自荐当起了党的政策理论义务宣讲员，成为芝罘区东山街道老干部宣讲团的一员。他走进机关部队学校、深入社区企业乡村宣讲，明眼人一下子就看出了他不俗的政策理论功底，并被他的慷慨激昂的演讲所打动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许多离退休干部党员自愿“投奔”于大卫，跟随他加入宣讲队伍。在他的带领下，宣讲团发展成为一支有70多位离退休干部党员参与的团队，从群众中来，到群众中去，影响越来越大。2021年，中共芝罘区委老干部局红湾银帆志愿者联盟吸收这支队伍为“红色宣讲联盟”。

于大卫这一干，就是21年。他撰写的宣讲手稿，敝帚自珍，都珍藏着，摞起来有1米高；使用的U盘有10多个。宣讲团结合国情社情民情，将声音传播到了天山雪域、大江南北，通过红色传统教育，助力党的基因在青年一代繁衍生息。

接任“团长”后，于大卫将全部宣讲员划分为14个工作组，每组5名宣讲骨干，各自都有详实的主题课件和宣讲方案。根据不同时间节点，配合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，宣讲团以基层社区、部队学校、机关企业为阵地，以党建传统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的创新理论、党史国史教育、军队国防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以及国际国内经济“双循环”为主要宣讲内容，着重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培养。

21年宣讲路，于大卫走得坚定踏实：带领团队累计宣讲1000多场次，受教育面达200多万人次！党员干部从中汲取了营养，普通群众和青年人从中受到了教育……

“只要还活着，我会一直宣讲下去！”于大卫用一句朴素的话，袒露出自己的一颗红心。